

第三章思考题：在中国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为什么没有用革命的方式而是用改造的方式？

段泽慧：一是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革命手段较为激烈，而脆弱的经济无法承受新一轮的暴力洗礼，因此采用较为温和的改造方式；二是因为部分先进的红色资本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突出贡献，采用革命方式容易激起人民的不满情绪，容易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相对并不稳定的政权造成冲击；三是因为如果采取和平赎买等改造方式，国家的经济恢复速度与获利会比革命要大很多。

林冬亮：部分先进的资本家对抗日解放有巨大贡献，直接革命有违人道，改造是和平的方法，也能提供一个过渡期，维持社会稳定。

方凡：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由国营经济向私营工商业者订货，然后收购其工业产品的形式。这种形式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有性质，但是由于这种加工和收购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它们的货源和商品市场，因而，这种方法对限制和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起到了一定作用。第二种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的中级形式。这种形式限制了由国家控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原料来源和商品市场，这便于国家对生产环节的监督，从而限制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同时，由于生产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被国家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脱离了自由市场，开始依附于国家或者公有制经济而存在。因而，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工商业部分地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成为了不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种是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逐渐发展为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中国的私有制工商业被消灭，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工商业体系。这个阶段，资本家除了从企业拿到一定数额的定息之外，很少参与企业的决策，只是有一小部分资本家仍在对企业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是在服从国家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的。由此，中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改造是在现有的事物下进行改变，而革命是会重头再来，而中国当时处于建国初期，无力承担革命所带来的负担，改造更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马国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之所以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其充分联系了工农，民族资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资产阶级是朋友而并非敌人。因此在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时，我们对于这些资本家主要采取政治教育，说服，劝导等方式获得其手中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合适的改造方式，用四马分肥的方式进行了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改革，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谢思远：“政权问题是任何革命的根本问题”。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我国能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和平改造的基本保证，也是党实行这个政策的首要根据。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迅速打倒了官僚资产阶级。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过去虽没有充分的发展，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二十多年中，官僚资产阶级已经掌握着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它的力量已大大超过民族资产阶级。例如1948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部工业资本中，官僚资本就大约占据五分之二左右。这些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在革命胜利后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手里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这就使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社会主义经济有条件迅速战胜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取得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同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工人阶级还可以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提高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可以有计划地建立和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因此就可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来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

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另一方面的根据，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生长起来的。他们和官僚资本主义不同主要在于中小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他们的力量比较软弱，同时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有矛盾。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在斗争中又常表现出一种动摇性和妥协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具体条件下，在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下，民族

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求发展本主义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毛得东同志指示我们：“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本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基于阶级关系的这些特点，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和工人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即“团结——批评——团结”，来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继续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对他们所经营的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在这里，团结是目的，斗争则是手段。团结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而言，斗争则是对他们的消极性而言，没有斗争，就无法达到团结的目的，没有团结，就不可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林佳漫：

- ①、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也奉献了一部分力量，若采取革命的方法，不免让人寒心；
- ②、新民主主义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其中资产阶级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不容小觑；
- ③、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处于领导地位。

廖雨欣：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建立新政权时，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他们将不少产业贡献给了共产党政权。而代表整个国家的新政权建立后，我国经济形势严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了树立自身的形象，保持自身的威信，需要进行社会体制的局部调整来缓和社会矛盾。因此，以和平赎买表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优惠政策来稳定资产阶级的民心，激发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爱国热情。同时，和平赎买政策可以减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阻力。

林蓉：在武装夺取政权，全中国和平解放之后。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确立了执政党地位，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境内的三座大山已经被推翻，他们已经没有暴力威胁人民的实力，因此不需要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社会主义革命是以经济建设为主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进行的。

刘唐娟：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是为了实现消灭私有制这样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而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大大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这也是在实践中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以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郭昊天：因为在过去，我们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情况下，通过政权的力量消灭了私有制时，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国家吃了很大的苦头。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也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搞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结果越搞越穷。这些事实都说明，消灭私有制是有条件的。不顾客观条件强行消灭私有制的做法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的规律，只能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林倩：中国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方法是通过三大改造来完成的，三大改造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逐步克服农业同工商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中共中央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1955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第二年，9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与此同时，90%以上的手工业者也参加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迅速展开。在这个改造过程中，我国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从以加工订货为主逐步向公私合营过渡。

1956年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并迅速席卷全国。”可见这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过渡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究其原因，之所以不是由暴力流血方式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成功确立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同时中国资产阶级势力软弱妥协如上第二点分析，最后通过国家对资产阶级合理的公私合营等的改造方式，即确保国家利益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资产阶级的权益，因而社会性质的过渡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得以和平完成。

廖沛亨：简单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另辟蹊径，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情条件下做出的创造性选择，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反而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坚持马列书本中的革命具体观点具体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不是具体结论的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中国化。

刘泽豪：新中国成立，人民安定，采用改造的方式，防止了阶级矛盾的激化，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